

民族关系视野下的近代西南边疆教案

张媚玲

摘要:随着清政府对天主教的弛禁,西南边疆教案频发。通过对此区域教案的分析,可以反窥近代以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列强关系为主线的西南边疆民族关系的一系列特征,具体表现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冲突关系,反洋教斗争队伍的变化及其性质的演变所反映出的帝国主义列强、官绅群体以及西南边疆各民族民众之间的关系,传教士利用本土教民直接参与军事侵略而引发民教冲突等,揭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觉意识在近代的形成过程。

关键词:近代;西南边疆;教案;民族关系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全球化的扩张,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与碰撞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关系的构成内容。所以,在民族国家形成及全球化背景之下,民族关系便不能再囿于一国藩篱之内。笔者认为,民族关系是指在自有民族分化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形成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包括一个民族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集团之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在相互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作用和冲突对抗中的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现象。^①近代,作为列强殖民扩张“开路先锋”的西方传教士打着神圣上帝旨意的旗帜,凭借着炽烈的宗教热情使其足迹遍布西南边疆的城市、乡野,直接、广泛且深入地与西南边疆各民族各阶层发生着接触与冲突,扮演着实质为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推进者的角色,激发了西南边疆各民族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传教士乘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冲开了中国宗教自主权的大门,以天主教、基督教为主的宗教传播及其侵略如水银泻地一般遍布中国,^②而地处祖国西南的边疆地区因其民族众多,近代化又晚于内地,民众所承受的社会经济压力也更为沉重,加之这一时期外国宗教势力的大肆入侵,使该区域的民族关系更趋复杂和尖锐,教案频发。

人类发展史表明,只要有文化接触,存在文化差异,就必然会有文化冲突发生。天主教、基督教是一种外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异质的文化类型。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西方国家是以基督教为文化主体的国家,而中国是以儒教为文化主体的国家,两种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这是亨廷顿对未来世界文明冲突的预见。事实上,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自古有之,近代西南边疆教案正是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冲突的关系表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被迫走上世界大舞台,中国文化的强势地位逐渐瓦解,西方传教士带着优越感想通过传布基督教来改变中国文化,“他(它)破坏了家庭,他(它)干涉了祭祖仪式;他(它)把那已经深入在他们生活中的佛教和道教的仪式说成是邪教,而对于他们传统的先师孔子的训迪,并不称之为‘圣’;他(它)要求他(它)的教徒们,对于本乡村和家庭的祀典的维持,停止贡献;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外国的宗教’。而这个外国宗教,除了那些人教的信徒之外,没有人承认它在任何方面比那些在中国流行的各种宗教更见好些。”^③

与基督教比较,天主教进入中国时间较早,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托项目“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阶段性成果(A080022);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近代西南边疆各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研究”阶段性成果(QN2009033)

作者简介:张媚玲,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云南昆明,650091)。

^①本定义借鉴了郑杭生主编之《民族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9-110页)一书及赵健君、贾东海的《民族关系定义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4期)一文中有关“民族关系”的定义。

^②这里所说的基督教指的是新教。

^③[美]马士:《中华帝国关系史》第2卷,张汇文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43页。

加之在清中叶的教禁政策使得天主教在百年来的地下活动过程中形成了自闭发展的模式,缺乏与主流社会的相互认同。两次鸦片战争使得西方宗教在中国获得不断弛禁的政策,教会活动逐渐从秘密转向公开,但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上的隔膜不可能随即消解。长期处于受压迫的教禁政策环境之下的部分教徒在弛禁之后,蕴藏于其内心敌视主流社会的仇恨心理迅速膨胀,部分传教士或教徒乘“强势”借机报复,与士绅民众发生冲突,成为导致19世纪中叶之后教案频发的重要直接原因之一。其冲突形式常常集中表现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的结点之上。

由于天主教、基督教的弛禁政策是依仗列强武力获得的,因此,在民众看来,传教与侵略两者互为表里,对武力侵略及其不平等条约的愤怒敌视自然延伸至教会及传教士乃至教徒身上。在敌视对立的情势下,基督教所传播的异文化思想及其行为均为被传播地——本土文化的持有者高度警惕并抵制着。一位出生于四川名叫韩素英的比利时人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清末发生在成都的一个事件:一位许配洪家而尚未过门的李姓姑娘,因其父受到教徒杜某的威胁,被迫将其改嫁杜某。结果在出嫁当天,李家姑娘于花轿中自杀身亡。随后数年中,四川发生了大大小小包括整个地区的各种规模的反基督教起义。^①这类事件突出反映了近代西南地区民众对外来宗教的抵制情绪。

此外,发生于贵州的数起重大教案表现为当地民族群众传统文化习俗与外来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例如,开州知州戴鹿芝以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及其教民破坏当地正月祭龙神传统礼俗为由,将其5人捉拿并在提督田兴恕“缉案就地正法”的指示下处死,^②遂使开州教案成为《北京条约》签订后全国第一个直接杀死外国传教士的案件,其影响超过了《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全国第一个教案——贵阳府属青岩地区各族人民“因端午节上街游行(民间习俗即游百病),于天主教堂外,口角缘故,民教竞争,酿成命案”的青岩教案。^③类似的案件接二连三。在炎帝节时当地群众前往火神庙建醮迎表途中遭遇天主教徒杨希伯等教民殴打、撕毁表文、砸毁神像,引

起双方扭打冲突,最终导致遵义教案的爆发。其实,早在“洋教士至遵义府属传教以来,凡本地素不安分之杨希伯、刘开文……入教中,借口在堂办事,欺凌孤弱,磕诈乡愚,出入公门,包揽词讼。遇有教民涉讼,被官审虚,则杨希伯等统领教众,闯入县署,逼官另断。如将教民看管,则用布教士名帖请释放……合城百姓,含冤积恨,勉强忍耐……”,直至炎帝节“惟时看戏人众,共怀不平,不呼而聚,致有打毁杨御街经堂之事……此次起衅,又因杨希伯寻事,先行纠众毁坏神庙,激而至此”。^④尔后,1869年7月,当地士民在《遵义城乡协议》中书表了传教士及其教众的10大劣迹,“我遵东门设立以来,并无死者出入。即有功臣阵亡,上为国家,下为百姓,必须奉旨方可穿城。乃洋人一人遵城……由恶(尔)等将死人抬进抬出,城内葬坟,有坏风水……洋人等男女混杂,朝日在巢穴……我们还愿敬天,反谓异端。我遵城做醮庆祝,被教中毁神扯榜,已非一次……永不许在我遵城设立天主堂,害我万民”。^⑤当时西南地区民间大量的反洋教文书文揭帖均反映了西方宗教与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诸如“彼教无君父之尊亲,惟耶稣之是奉,是无纲纪也。无骨肉之亲爱,惟主教之是崇,是无伦常也。且已有妻女任其与主教褻淫,则廉耻丧”。^⑥此类揭帖在全国不胜枚举,尽管其中存在由于仇视或不明就里引起的误解,但杂糅于各种冲突中的文化因素十分明显,并且由于外来入侵力量和文化使得整体社会处于被侵犯、原有秩序被破坏的情况下,固有的传统文化遂成为一种凝聚同质群体抵抗持有异文化的侵入者的力量和旗帜。

二

近代西南边疆反洋教斗争队伍的组成和变化是帝国主义列强、中央政府、地方社会官绅上层群体与地方民众关系及其演变的体现。清末政府对天主教的弛禁政策是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而被迫逐渐放开的。1896年清政府总理衙门专门颁发的《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文件将传教士按品秩与清政府官员相应官阶用条文固定下来,使传教士获得了与地方官一起解决教务纠纷

①[英]韩素英:《残树》,祝钰等译,北京: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②《开阳县志稿》第九章“宗教”,转引自罗开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史料概述》,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02页。

③《贵州通志·前事志》二十七,转引自罗开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史料概述》,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④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43页、第46页。

⑤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47-48页。

⑥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17-18页。

的法定权力。其间呈现出两条发展态势相反的线索：一是随着弛禁之后列强及其传教士以炮舰和教案事由步步紧逼、清政府则步步退让而不断攫取在华的各种权力和利益，官绅阶层迫于中央政府愈加严厉的“袒教抑民”政策不得不由初期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支持反教转而与勾结洋人的清政府站在一边；另一方面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由最初出于官绅阶层的反教行为而对其怀揣着希望并积极响应参与反教斗争行列，逐渐自发组织起从反教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行动。

近代，伴随着列强炮舰深入西南边疆各地的西方传教士及其行为引发的教案使得西南边疆社会自上而下各族人民亲身体会到被征服者所遭受的践踏和屈辱，相对各列强政府而言，目的不端的传教士及依附其“吃教”、“恃教”教民的劣迹实实在在与西南边疆各阶层民众的生计、财产、情感发生着最广泛、最直接的联系。因此，西南边疆各地频发的教案是源自社会最广泛阶层的切身危机感的直接反应，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救民族于水火的理念从来就不会横空出世，以征服者姿态凌驾于包括西南在内的全国各地民众之上的传教士及其附众，不分阶层地给西南边疆各族带来了广泛的切肤之痛。基于共同的创痛，在这片土地上燃起的点点反教星火与中国各地的反教运动共同汇集成为号召于“中华民族”旗帜之下救亡图存的熊熊巨焰。

19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相继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打击的清政府被迫一步步放开教禁政策，这一阶段为弛禁初期。进入西南边疆以天主教为主的西方传教士及其不良教民由于长期的教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立的和自外于中国同胞的团体”。^①难以适应外部世界的教徒对教会的强烈依赖，以及形成的对主流社会的仇视报复心态，随着弛禁后教会的发展，“吃教者”数量徒增，教会负担愈加沉重。为解决供给问题，天主教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利用各种机会谋求利益，如利用教案勒索赔款、利用灾害低价购田置地、经营房产、利用教徒开垦荒地等等；加之教会特权保护下怀有伺机报复心态的教士及教民得以将长期压抑的仇视情绪付诸于实际行动，打破了地方社会原有的秩序，故而动摇了西南边疆地方官府、士绅在权

力、资源占有上固有的地位。外国传教士干涉地方政事，藐视地方官员的行为也令清廷官吏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侵官吏之权，事已难恕，甚至侵国家之权，情实难忍。似此无礼已极，安能不犯众人之怒！”^②这一阶段，由于清政府尚未深刻领教由教案引发的外交压力，因此尚未形成来自中央权力对地方官绅的有力钳制。西南边疆在此期间所发教案中，表现出了地方官绅群体居于反教队伍主导地位的关系特征。如1856年和1857年的西林教案，19世纪60年代发生的梧州和桂林的3次“反教”事件均由当地官绅所主导；同一时期爆发于四川的几次重大教案：重庆教案，第一、二次酉阳教案均为当地绅首所主导，当时被派往处理该案的清廷官员李鸿章总结酉阳教案的起因时说：“本地痞匪入教者，依势欺压平民……激成巨案”，^③而重庆教案则因传教士范若瑟持批准文牒拆了原为川东三十六属团练保甲办公之地的长安寺，修建了真原堂，此举影响了当地绅首利益。这一时期，贵州提督田兴恕及巡抚何冠英公然以公函的形式运用行政、武装权力极力反教，^④更为鲜明地体现出由地方最高行政和军事官员为主导的反教特点。在地方最高行政和军事官员明确的反教指示下，尽管手持法国驻华公使颁发的“传教士护照”的传教士及其教民也未能在贵州获得“合法”权力的保护。1861~1862年分别发生了青岩和开州两大教案，两教案刚告结3个月，又发生了永宁州（今关岭）教案。1865年6月，在布依族、苗族聚居的永宁州属募役司地方，发生了团首任聚五与永宁州革役罗胜为首的杀害传教士杨通绪和教民谢长生等5人一案。

19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曾国藩所处理的“天津教案”明确了清政府“袒教抑民”的政策，此后，在西南边疆各省教案中，地方官员被迫加入到了护教行列，士绅则逐渐退出了“反教”行列。然而，此后仍发生了由四川黔江县知县桂衢亨一手炮制的黔江教案——致法籍神甫余克林和华籍神甫戴明卿被殴毙命，而此案却受到四川省省级官员的一体维护，最终除了少许赔偿和一名“正凶”在中途不明不白死亡之外，其他涉案人员并未受到任何追究。^⑤由此可见，清政府的“袒教抑民”政策并未立即遏制住地

①[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99页。

②“公元1871年总署与各国人臣商办传教务款”，转引自罗开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史料概述》，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③《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5，转引自隗瀛涛、张力等《四川近代史》，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④王明伦：《反洋教文书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281页。

⑤参见李重华《从黔江教案看晚清教案的一些内幕》，《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

方官绅反教的情绪和行动。但这一时期反教的总体趋势已由官绅主导发展为民众主导,并发展至“反帝”、“反清”的程度,之后教案数量明显激增,并以四川及川滇藏区最为显著。1886年,四川大足、铜梁、南川、綦江、江北等地人民发起规模不等进行打教斗争的第二次重庆教案,其中数次爆发的大足教案均由余栋臣和余翠坪兄弟接连从1886~1890年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大足县龙水镇传统的灵官会期联络组织所为,并于1890年8月8日在龙水镇正式竖旗起义。1892年9月,起义军暂时被镇压下去。1898年,余栋臣又率领大足各族人民进行了第二次起义。1908年,美姑县牛坝彝族人民为阻止美国传教士巴尔克闯入测绘地图、勘察矿产而发生冲突,巴尔克枪杀阿候拉博等两人,巴尔克及其随从被愤怒的彝民击毙;次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派清军3000人前来镇压,阿候家支、苏呷家支的彝民奋起反抗。1911年,会理彝、汉人民杀死作恶多端的法国神甫贾元贞所致大凉山教案,官方以割地、赔偿及斩杀反抗教会农民10余人之众的“保教抑民”的立场激发了张耀堂领导下的西昌彝、汉人民灭洋反清的起义。近代以来,西藏地方上下阶层一直抵制英法势力进入藏区,“西藏上层看到英东印度公司并吞印度,欺凌尼泊尔、不丹、锡金的称霸行为,积蓄下英国人以及此外的欧洲人的仇恨”,“在中国门户被英国炮舰打开以后,法国传教士在四川西部、西藏东部,也频繁活动,公然表示他们想把福音带到世界屋脊上‘昏庸无知的居民’中,挑拨尼泊尔同西藏的关系,并鼓动英印政府吞并西藏,又燃起藏族保护乡土和固有宗教信仰的热情”。^①因此,西藏僧俗上下一体严防洋人及天主教信徒入藏,“如有已入天主教之人,一概不准给票出口”;^②“藏中番众一闻洋人入境,哗然聚兵拦阻,情势汹汹……藏番意欲驱逐洋人……该藏番遍扎巴塘、里塘、霍尔章谷、叠盖各土司,及云南所属阿墩子、中甸、维西等处寺院僧俗人等,以后一体不许洋人过境,亦不准各处迎护接送各等情来……意在必得永无洋人游历入藏结据,并允以后驱逐法国教堂(士),始肯退兵,二者缺一不可”。^③川滇藏区成为藏民“反教”的主战场。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清政府急忙筹划“经营”川边藏区,谕令四川总督锡良会同驻藏

大臣有泰,帮办大臣凤全“妥善办理”。凤全一到巴塘,即发布谕令,限制喇嘛权利及其人数,限制开垦荒地等,并着手部署实行改土归流。加之凤全对教会势力奉行清廷的“保教抑民”政策,藏民认为他是为洋人办事而来,更激起了藏民的愤恨。1905年4月2日~29日,巴塘藏民焚毁教堂,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发生激战,尔后凤全及其随从50余人被杀,在英法公使施压之下,清政府派提督马维祺、永宁道赵尔丰“进剿”,杀藏民数百人,镇压了巴塘藏民的反教会斗争。这就是全川教案史上绝无仅有的击杀封疆大吏的巴塘教案。此案很快掀起了川滇边境藏区阿墩子、云南贡山的白汉罗村的汉、藏、怒、独龙各族人民从反洋教发展至反帝反清的斗争。

以上教案反映出19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至20世纪初西南边疆民族关系发生的明显变化,即在半殖民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中央及地方政府日益被迫沦为侵略者镇压各族民众的爪牙,本主导各族民众共同“反教”的当权者站在了侵略者一边,失去政府保护的各族民众反抗外强的义愤之举居然遭到了本应作为保护者的镇压。于是,西南边疆各民族的矛头从“反教”开始转向“反教”与“反清”并举。

三

除经济、文化的掠夺和压迫外,西南边疆地区的教会组织还利用当地教民作为列强在发动侵略战争中的内应。这种直接参与侵略战争的行径更激发了当地驻防官兵及各族士绅民众对教会组织及其教民的敌视对立情绪。在中法战争期间,与越南接壤的广西和云南两省所发教案几乎皆由此因引起,直接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的西南边疆各民族与人侵列强之间的对立关系。

中法战争前夕,桂西的南宁、太平、泗城等府的士绅从法国在越南建堂传教的后果便察觉到建堂的危险性,指出:洋教士“必将里外勾通,蚕食为害,不可不防”。^④在战争期间,1884年5月10日,据《编修王濂奏沥陈仪和流弊折》载:“滇省矿利,法人窥伺已久。……现在中国之失越南,亦犹越南当日之失西贡,将来法人之图中国,安知其不如今日之图越南。越南之失,皆由教民为内应。中国欲无后患,教民不可不

①邓锐龄,陈庆英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641页。

②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287页。

③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295~296页。

④光绪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广西巡抚庆欲奏《法人欲在南宁等府建堂传教预防范片》,见《光绪朝中外交涉史料》卷2,第8页,转引自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卷2,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防。”^① 1885年2月4日,据云南省丽江府云州知州黄毓全所禀查访旧衙坪教民起衅案件:司铎艾若瑟在中法战争间向教民传言“法国兴兵大胜,有信叫各处经堂准备接应”,“从了教的,就是法国的人,日后要用他们,就是出力报效的日子。密调黑马上各处教民九月齐到旧坪起事”,“将黑马上各处教堂加修,高比城寨”,“暗中添价买米,夹带军火,被人查知传说”,得知“其情已露”,“该教士二十四日募转教堂,各处教民,络绎而至,日夜聚人密运军火,均为人所见”,“彼教自难掩饰,骤于二十八日寅刻,由教堂督众冲出喊杀,民人一心,同时赴难,彼教众寡莫敌。旋因教堂火药轰发,艾若瑟遂部奔北而逸”。之后“惟查起获教堂零星军火等物,内有洋印号片九十一张,洋码子一百二十三颗,决非他人所能造……故该教士于事败之后,知其谋情显露,所甘匿迹窜身他者,而不敢呈控与质者”。^② 战争期间多次发生在广西上思、北海两地的教案,就是由于教士利用教堂勾结匪徒、暗藏武器以图策应法国在越南的军事侵略而起。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报镇南关战役的结果“教匪路熟先遁,法兵多歼”,“所毙真法兵,黑兵千余,法酋数十,客匪、教匪数百”。^③ 由以上云南永北厅旧衙坪等教案及镇南关战果的奏报可以证实教会组织直接参与到了侵略战争之中。

四

综观近代西南边疆的教案所反映出来的民族关系的特点,可以做如下小结:

首先,弛禁后的传教士及其组织获得了在西南边疆立足、发展扩张的机会,恃强自居的传教士及其附众广泛且深入地与西南边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着密切的接触,身处生计财产、名誉地位均面临动摇、颠覆危机之下的西南边疆各阶层民众,自发地在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号召下凝聚起来排斥着持有异文化的人侵者,使得近代西南边疆的教案又表现出西南边疆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与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关系。

其次,清中央政府与列强之间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地位和态度决定了西南边疆地方官

绅阶层“反教”立场的变化,其最终结果便是将西南边疆各民族群众推向了“反帝”、“反清”的历史舞台。西南边疆的教案还明示了近代传教士利用本土教民直接参与列强政府对西南边疆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关系事实。

再次,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南边疆教案频发,涉及面广,有些教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广西,由于传教士“搜集情报,霸占土地山林,包揽词讼,勾结官府,欺压群众”,激起了各族人民的义愤,“群众仇教揭贴,打毁教堂,驱逐教士,先后爆发的反洋教斗争不下十数次”。^④ 西林教案直接造成了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在贵州,“从1861年到1900年,共发生教案30余起,教士、教民32人被杀,伤者更多,如1886年绥阳普老场教案,教徒受伤者达82人”。^⑤ 开州、青岩教案接连造成命案,激化了民教冲突。川滇藏等地的教案则直接促发了各族人民的反帝、反清斗争。有研究表明,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大小教案共发生约400余起,较为重大的教案有25起,^⑥ 其中发生在西南边疆的重大教案就有多起,如1856年的西林教案,1861年的贵阳青岩教案,1863年、1886年两次重庆教案,1865年、1868年的两次酉阳教案,1890年的大足教案,1895年的成都教案,1905年的巴塘教案等。这些教案不仅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体现,也是近代西南边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认为,近代发生于西南边疆各民族中为数众多的教案,是由最初迫于利益危机、生存危机而引发,然而,大范围层出不穷的共同外来危机使得相同处境下的个体需要寻求某种共性以抵抗危机,而各个民族在长期统一国家基础上形成的固有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正是内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内因。因此,教案本身既是个体应对外来危机的反应,又是唤起深受危机之中的民族群体国家认同感、民族认同感的体现。近代西南边疆的教案正是各族人民汇入中华民族共同抵御民族危机历史洪流的一部分,更是催生近代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过程和表现。

(责任编辑 段丽波)

①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39页。

②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第72~75页。

③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二日《钦差办理广东防务彭玉麟等奏折》,见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六),北京:新知出版社,1955年,第456页。

④《壮族简史》编写组:《壮族简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2~103页。

⑤杨策、彭武麟:《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

⑥李伟:《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民族关系视野下的近代西南边疆教案

作者: [张媚玲](#), [ZHANG Mei-ling](#)
 作者单位: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1](#)
 刊名: [思想战线](#) [PKU](#) [CSSCI](#)
 英文刊名: [THINKING](#)
 年, 卷(期): 2010, 36(5)
 被引用次数: 0次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陈岗](#). [CHEN Gang](#) [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以广西苍梧戎圩为个案研究](#) - [中国农史](#) 2007, 26(1)

近代前后, 广东商业移民是推动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力量. 本文依据方志、年鉴等方面的资料, 以苍梧戎圩为个案, 追踪考察近代广东商人的商贸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农家经济变迁之深刻影响.

2. 期刊论文 [张媚玲](#). [张曙晖](#). [ZHANG Mei-ling](#). [ZHANG Shu-hui](#) [近20年来中国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述评](#) - [思想战线](#) 2009, 35(3)

通过对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专著和论文的梳理, 发现目前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十分薄弱, 主要表现为研究学者不多, 研究成果少、不系统, 研究视野大多局限于传统革命史范畴, 尚未构建起与西南边疆近代民族关系史相适应的研究框架.

3. 学位论文 [马玉华](#)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 2005

民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短暂的, 但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 民国时期曾出现调查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热潮. 当时的调查分为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和个人的调查三类. 过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与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作过研究, 但对国民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却未见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 有关的调查资料仍散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西南几省的档案馆中, 大量资料迄今未得到整理和充分利用, 这不能不说是西南民族研究中的一个缺憾.

对国民政府的调查进行研究, 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20世纪前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全貌, 构建完整的中国民族学史. 对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研究, 可以为今天的民族研究服务. 整理研究当时的民族调查成果, 有助于今天对近代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丰富西南民族史的内容. 对国民政府治理边疆地区的思想、边疆民族政策及他们治理西南民族地区措施开展研究, 可以为党和政府今天制定边疆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某些借鉴. 课题研究的结果能为党和政府了解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状况, 为政府的相关决策积累资料, 为西部大开发服务. 因此, 我选择了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作为论文题目.

本文主要针对国民政府官方组织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研究. 从时间上来说, 研究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即1927—1949年, 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40年代. 从研究的空间来看, 由于民国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异常繁荣, 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发展的标志, 因此本文以西南地区(即云南、贵州、四川和西康)作为研究的范围. 从研究的内容来说, 只涉及国民政府及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几省地方政府的官方调查, 学术团体及学者个人的调查暂不在本论文之列.

由于这些调查资料没有进行过系统整理, 散存于南京及西南各省的档案中, 要从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查全查准所有资料是很困难的. 因而本文重点研究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目的, 即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政策及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措施, 并对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给予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

本文首先分析了20世纪前期,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 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及民族学的诞生这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国际背景; 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浪潮,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国民政府建立后, 为加强其政治统治和国防的需要, 中国学者的民族自强精神等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的国内背景; 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抗日战争爆发后, 政府和学术团体的西迁, 民族学调查研究重点西移, 使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成为可能. 这说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视和调查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 本文对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的诸多调查进行系统研究和归纳, 将其分为三大类: 一是政府通过下发调查表格, 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 二是中央和地方边政机构的调查; 三是政府派出考察团及相关人员开展的调查. 根据西南各省调查情况, 对第一类调查, 即政府通过下发调查表格, 自上而下组织的调查, 又进一步归纳和分类, 云南的调查可分为5类, 贵州、四川和西康的调查分为4类.

再次, 全面系统地研究国民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政策及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的措施.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视和调查, 是其治边思想的体现, 而这些调查又对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 由于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 形成了新的民族观(中华民族一体观、中华民族一元理论)、边疆观及民族平等观等治边思想, 并形成了以民族平等, 民族同化, 扶植边疆民族自决自治, 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 国民政府在西康建省、对西南土司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移民垦殖及发展边疆教育等治理措施, 又是其治边思想和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贯彻和实施.

最后, 对国民政府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进行全面地实事求是的评价与总结, 既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也指出其局限性.

主要观点和创新之处:

(一) 国民政府对边疆地区及西南少数民族是比较重视的. 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算起至1949年, 在大陆的统治只有22年. 但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反映了当时民族危机和国内统治危机下,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视.

(二) 国民政府的调查既是其治边思想的体现, 又对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形成了新的民族观(中华民族一体观、中华民族一元理论)、边疆观、民族平等观等治边思想. 政府重视西南边疆, 调查西南少数民族情况, 正是其治边思想的体现. 在调查基础上, 形成了以民族平等, 民族同化, 扶植边疆民族自决自治, 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民族政策.

(三) 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措施, 主要有西康建省、对西南土司的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移民垦殖及发展边疆教育等. 这些措施对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反对分裂, 加强政府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 改善边疆人民的生活及提高边疆人民文化水平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这是首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民族调查. 清末, 作为清政府“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 清政府理藩部曾对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过3次调查, 内容有垦务、木植、牧场、野兽、皮毛骨角、铁路、矿产、渔业、盐务、兵制、学堂、台站、疆界、商务等. 这些调查主要在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进行, 而且这些调查是为兴办实业了解情况, 对兴利实边有一定益处. 清末, 还对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过边界调查. 但这些调查并非专门针对边疆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开展大规模的官方少数民族调查,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这种政府组织的调查, 突破了以往国内民族学调查中的学术团体及研究者个人考察的局限性, 以大规模的系统调查来搜集全面的西南少数民族资料, 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调查次数和种类较多, 调查内容全面丰富, 是民国时期西南民族情况的真实记录.

(五) 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 既为政府的民族调查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 同时, 政府的调查又促进了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 这是中国首次使用西方的民族学、社会学调查方法开展的大规模官方调查. 许多留学回国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参加了这些调查工作, 他们运用了西方民族学、社会学的调查方法, 使西南民族调查具有科学性. 政府对民族学的鼓励和运用, 促进了民族学中国化的进程. 相对于现有的民族学史研究而言, 本课题关注的是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官方调查, 这是过去的学者没有进行过的研究, 这是选题方面的创新; 所用的资料大部分是第一手档案材料, 且许多材料过去没有研究者使用过, 这是资料方面的创新. 充分利用档案资料, 是本论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首次对国民政府的官方调查进行集中研究, 系统梳理, 将其进行了分类, 并进一步研究政府的治边思想、边疆民族政策及治理西南地区的措施, 这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 用历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对当时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分析, 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尝试.

4. 期刊论文 [周智生, 吴映梅](#) [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民族乡村的农业商品化浪潮——以滇西北为中心的考察](#) -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7, 28(9)

本文以近代地方民族商人发展崛起过程中对滇西北多民族地区农业的商品化渗透为研究基点,探讨并梳理了滇西北民族乡村农业商品化浪潮下的发展表征和具体变迁内容。研究表明,在以滇西北为缩影的近代西南边疆民族乡村地区的农牧业商品化发展的过程中,本土民族商人扮演着重要的推动者角色,而且其实际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这是这个特殊的边疆多民族地区近代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景象。

5. 期刊论文 [段金生, Duan Jinsheng](#) [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2)

近代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国人围绕新疆的战略地位、民族与宗教关系、如何开发新疆等问题展开多方面的讨论。由于战略地位凸显,国人将新疆视为国家存亡的关键乃至亚洲地区安危之所系,并认识到民族与宗教是新疆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首要问题,全面开发新疆对稳定新疆及巩固国防意义重大。这体现了对新疆地位认识的逐步深化。

6. 期刊论文 [周智生, ZHOU Zhi-sheng](#) [族际商贸交流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的经济生活——以滇西北为中心](#) -中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27(3)

本文以白、纳西、藏、傣、普米、怒、独龙等多个民族世居的滇西北地区为研究中心,试图展现民族间商贸活动与近代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变迁间的具体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族际经济互动是促进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生活转型的内在动力和重要基础。

7. 学位论文 [邓启贵](#) [近代云南海关人事制度研究](#) 2007

清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云南开关是中国西南边疆史上一件值得关注大事。但在今天已经硕果累累的海关史研究当中,以云南海关为代表的西部海关研究却一直较为薄弱。而具体到海关人事制度研究本身,则更为欠缺,甚至可谓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而本文正以近代云南海关人事制度作为切入点,对人事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分析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制度优劣进行深入总结,从制度层面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具体至论文的构架中,本文利用人事管理学的结构框架,将近代海关人事制度分为更新机制、调节机制、激励机制、保障机制四个部分。而在每个部分当中,又分为若干重点加以分别论述。各部分研究将首先从人事管理学的相关定义入手,然后结合当时海关人事体制当中相应的部分加以说明与论述,在此基础上应用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费用以及产权方面的相关理论,对整个制度优劣做出分析与评价。而本文所要着重考察的在于以下问题:在相当长时间里,海关的廉洁、高效一直是作为其重要的亮点而被人称道的。那么这个廉洁高效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呢?其中的制度安排又如何?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涉及较少,缺乏深入。

而本文便是就此做一些工作,而其研究方法可以放大到全国海关系统乃至整个民国公务员系统的研究中,并以史为鉴,使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相结合,为完善公务员制度提供个案研究。

8. 期刊论文 [张泽洪](#) [近现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述论](#) -宗教学研究2001, ""(2)

近代以来外国旅行家、传教士、学者,纷纷进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类学界开始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科学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是近现代国内外研究者考察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对近现代西南少数民族宗教考察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性的评述,认为中国人类学者投身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学术精神,值得21世纪的中国民族宗教研究者汲取弘扬。

9. 期刊论文 [吴喜](#) [试论抢救滇东北彝族上层史学资料的必要性](#)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 32(4)

在概要滇东北地区彝族上层社会地域政治关系变迁的基础上对近代滇东北地区彝族上层社会围绕着血缘、地缘、业缘、族缘等关系以及相互间开展的各项活动进行分析,认为近代人士对近代滇东北彝族上层社会的研究尚存在很大不足和研究成果的“失真”,当代学者也由于研究资料的不充分而导致研究过程和层次的不够深入,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时段进行资料弥补,并提出开展紧急抢救这一文史资料的紧迫性。

10. 期刊论文 [Wang Chuan](#) [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西康建省及其历史意义](#) -西藏大学学报2008, 23(1)

在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及边疆开发史上,西康建省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文章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勾勒了近代以来的西康省的建立历程,重新审视了西康建省的历史意义。指出,西康建省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加强康藏关系、治理康区、巩固西南边疆与西南国防、建设抗战大后方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反对“西藏独立”的战略部署之一;同时也是这一地区向现代社会迈进启动的重要里程碑,并对以后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zx201005022.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f7a26cac-fba3-488e-86a5-9e4d0084a630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